



乡村叙事

吴鹏森 著

故乡的骄傲

父亲和母亲

忘不了的少年旧事

乡村中的政治运动

1969年记事

我的读书经历

民办教师三年（上）

民办教师三年（下）

生产队印象

乡村秩序重塑

上海三联书店



乡村叙事

吴鹏森 著

上海三联书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乡村叙事/吴鹏森著. —上海:上海三联书店, 2017.

ISBN 978-7-5426-6106-7

I. ①乡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53098 号

乡村叙事

著 者 吴鹏森

责任编辑 钱震华

装帧设计 陈益平

出版发行 上海三联书店

(201199)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

印 刷 上海昌鑫龙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640×960 1/16

字 数 240 千字

印 张 22.25

书 号 ISBN 978-7-5426-6106-7/I·1334

定 价 68.00 元

序

秦维宪

—

从上海 145 年未遇的炎炎酷暑到略显凉意的早秋，我在两个月内陆陆续续收到鹏森兄发来的《乡村叙事》书稿。当我仔细阅读这部浸透着血泪与深邃思考的纪实作品，深为作者对人生、对家庭、对国家负责任的大丈夫情怀而感动；深为作者在当代中国文坛浩如烟海的传记中独辟蹊径，为当代、为后世留下了一部融个人经历与理论探索为一体，在哲学、历史学、社会学、政治学、经济学、教育学、心理学等诸学科的交叉思考中揭示历史本原真相的专著而欣喜。

更深夜静，伴随着上海郊外田野和草丛里的虫鸣声，我沉浸在鹏森兄泣诉如歌的业已流逝的岁月中，脑海中浮现出与他交往的历历情景。

十几年前，当鹏森兄从长江之畔的安徽师大引进到东海之

滨的华东师大,我们便一见如故。在我对鹏森兄重重叠叠的诸多印象中,犹觉其不仅有三国大将张辽威震逍遥津的伟岸身躯,更有丰富的知识和理论修养,无论谈什么样的历史与社会话题,他总会发出充满“独立之意志,自由之精神”的识见。仅以鹏森兄发表在我主持的先锋刊物《探索与争鸣》上的众多论文,几乎都被《新华文摘》、《中国社会科学文摘》、《中国高教文摘》、《人大复印资料》转载而言,可见其功力之深厚。

何况,我们还相邻而居 12 年。在这 12 年中,我们曾无数次漫步在吴淞江上游的江边小径中,鹏森兄陆陆续续地向我讲起过自己少年时代的农村生涯,我亦以一个老编辑和传记文学作者的敏感,鼓励他记下这人生的一页。

此刻,当我读完鹏森兄的《乡村叙事》,更加了解他之所以有浓厚的家国情怀、平民意识、公正理念,盖因其丰富的人生经历使然。

我与鹏森兄有缘,从他找我作序这件事足以为证。鹏森兄云,他不想找名人作序,只希望找一个了解他的好友作序。巧得很,我宛若一只茫然在天、破云而出的老雀儿,算是被他一网逮住了!

我与鹏森兄之缘,举其荦荦大者有五:

其一,我虽痴长鹏森兄几岁,然均属苦难的 50 后。尽管我主要生长在城市,他主要生长在农村,然而我们均经历了那个特殊的年代,亦一次次沉浮于政治运动的波涛之中。

其二,我们都是草民之后,没有祖辈、父辈的大树好乘凉,没有红色光环可笼罩,因而能更深切地饱尝草根人生的艰难。

其三,我父亲 1958 年从上海银行报名支援人民公社,一去几十年,直至退休,还为乡村的公路建设贡献了 10 年,回城没过几年晚年生活,便遽然与世长辞。因此,我从儿童时代起,便一次次渡过黄浦江,来到父亲工作的南汇老港公社和六灶公社,从而对乡村的一草一木怀有深厚的感情。尤其在 1961 年,也即中国三年大饥谨的最后一年,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去父亲处玩,一位得到过我父亲帮助的老农民,将家里仅有的一碗蚕豆捧给我们吃,此情此景使我感到,中国的农民是世界上最善良的人,是老黄牛中的老黄牛!

另外,我的姑父恰好也是安徽桐城人氏。他是一个孤儿,后来投身革命洪流,参加过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战争。他生前对我讲过家乡的美丽山水和历史上文曲星光辉灿烂的故事。当然,也讲过不少家乡老百姓苦难的实情。除了讨饭外,他的许多描述与鹏森兄的叙述并无异样。自我姑妈于上世纪 50 年代随姑父去庐江、郎溪等劳改农场工作后,我也曾多次去探望他们。特别是 1991 年华东地区爆发特大洪水,我单枪匹马去三河、肥西、巢湖、庐江、无为等地采访,我所见到的灾情,以及听表弟们转达的白湖爆破东大圩泄洪的悲壮之举,可能比鹏森兄书中描写的 1969 年桐城特大洪灾更加惊心动魄。所以,我对安徽这片浸润着楚文化的江淮大地、对世代艰难困苦的江淮父老乡亲怀有很深的感情!

其四,我与鹏森兄一样有较为丰富的人生阅历。他在安徽当农民,我则在上海一家破旧的小厂当工人将近 7 年。经连续三次高考,我才于 1979 年夏考入华东师大历史系,其间遭受过

各种沉重的打击。他在农村担任民办教师，我则在上海市七一中学执教过一年，当孩子王的辛劳与乐趣相当一致。他毕业后在高校执教至今，我则在党校执教将近10年，对高校当教师的复杂和高远自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他长期从事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，我则长期从事理论期刊的编辑工作，因而他广泛涉猎的领域，亦是我这类“三脚猫”、“万金油”必须了解的。正因为如此，遂有我们之间一次次的愉快合作，共同享受金秋的收获。从写作的角度来说，鹏森兄有几十年写作论文、专著的体验，这次创作传记体回忆录，更是一炮打响；而我自上世纪80年代起，也有几十年的写作经历，同时搞了几十年的纪实文学、传记文学创作，故对这类体裁的欣赏、写作，还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此乃我们这次合作的重要基础。

其五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即亲人的去世都给我们造成了致命打击。1968年，鹏森兄仅12岁，他的慈父便在贫病中突然去世，一句话也没有留下。在三年大饥谨时期，他家更是饿死了三位至亲（后文将详述），这对于一个从小失怙的乡村少年而言，导致他形成了终生的忧郁性格。他在《乡村叙事》的前言中剖析心迹，写这本书怀有对父母的追思和强烈的怀念之情。他像高尔基一样，面对不幸，没有屈服于命运，做出了许多成绩，这点比我强多了。我家的悲剧不亚于鹏森兄，我祖父作为对民族做出贡献的一介书生，建国后却长期遭受迫害，在“文革”中悲惨地死去；连带我祖母的下半生，一直在被歧视的压抑中讨生活，亦在一个寒冬去了天堂；我苦难、清贫的父母在“文革”中被关进“牛棚”，暮年也都是一句话没留下，便遽然去世，他们一生没享受过

生活的欢愉。这些,导致我从青少年起,就是个很少有欢乐感的人,尤其步入晚景,除了一生养成的读书习惯,几乎对任何事没有兴趣,心情之忧郁难以用笔墨形容。当夕阳西下的愁云笼罩心头时,这种对亲人的思念愈加强烈。这一点,我与鹏森兄是一样感同身受的。

上述五点,便是我为鹏森兄的《乡村叙事》作序的缘分,也是我们对人生、对社会、对历史负责任的表现。

我读了《乡村叙事》,觉得这是一本能够流传后世的佳作。这里仅讲三点,作为自己近年来浏览并创作传记作品的体会。

首先,《乡村叙事》具有可靠、翔实的史料价值。这不仅仅因为鹏森兄作为历史的亲历者,对农村的大集体时代有深刻的反思,还在于他所叙述的乡村故事,是正史中无法见到的,更在于作者有强烈的尊重历史、敬畏历史的情结,故不作任何细节的虚假叙述。不像有些传记作者,包括那些位高权重者,在回忆往事时,凡是有利于自身形象塑造的,便大加吹嘘、无限拔高,而涉及自己人生走麦城的,遂虚与委蛇,以致造假,蒙混历史,乃至给后人留下不实之作。鹏森兄对史实的匡正,是以自己的人格做保证的,从而践行了德国的兰克史学流派所倡导的,一切历史的述说和阐释,都必须经过考证、建立在真实的历史事件之上的理念。同理,鹏森兄自觉地遵循班固在《汉书》中引用刘向、杨雄评价太史公所云,“迁有良史之才。服其善叙事理,辩而不华,质而不俚,其文直,其事核,不虚美,不隐恶,故谓之实录。”由此,鹏森兄才能产生经得起时代、历史检验的史识和史感,诚如恩格斯评价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时曾云,“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其他哲

学家的地方,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。”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段名言观照《乡村叙事》,信然。

其次,《乡村叙事》弥补了芸芸众生走上历史舞台,甚至成为历史主角的空白。我读史几十年,且不说中国的一部二十四史,包括《清史稿》,以及欧洲那些宏大的史学著作几乎均以帝王将相、名人贤士为历史的叙事对象,很少见到如太史公在《史记》中为《游侠》、《刺客》、《滑稽》等凡夫俗子作传的史著。目前,中外史学界都看到了昔日治史在这方面的缺陷,从而开始注意底层大众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。例如,我的恩师华东师大历史系王家范教授,是著名的明清经济史专家。近年来,他在钻研史著的同时,格外关注当时的俾文野史与各类笔记、方志,力求从中获得正史看不到的历史信息,以弥补正史之不足。

多年来,我也读了一些在特殊年代,底层苍生撰写的回忆录,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彭小莲的《他们的岁月》、韦君宜的《思痛录》、从维熙的《走向混沌》、刘海军的《束星北档案》、杨显惠的《夹边沟记事》、高尔泰的《寻找家园》、戴煌的《九死一生》、于疆的《苏北利亚》、冯骥才的《一百个人的十年》、老鬼的《血色黄昏》等等,这些回忆传记均以叙述为主,除高尔泰对夹边沟劳改农场的反思、戴煌对新华社反右的反思较有理论色彩外,其他的一般不作理论透视;而彭小莲叙述其父、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党内代理人彭柏山夫妇的遭遇时,文中所披露的惨痛历史、革命队伍中的告密和落井下石,令人震撼、令人痛心!不过,今年刚出版的冯骥才的《地狱一步到天堂——韩美林口述史》,对韩美林从鬼到人的跨越有难得的思考,是近年最具冲击力的反思文本之一,但这

部书是对话体。自然,改革开放初期,也出过不少反思历史的传记体小说,如戴厚英的《人啊人》、《诗人之死》、张贤亮的《绿化树》、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》、鲁彦周的《天云山传奇》、礼平的《晚霞消失的时候》等,这些书或多或少有理论思辨,但毕竟是小说,有虚构成分。

反观《乡村叙事》,则给人耳目一新之感,鹏森兄在娓娓叙述人生故事时,采用夹叙夹议的方法,大段大段的作理论思考,从而令读者在作者时而插叙、时而倒叙的跌宕起伏的情节中,获得思想上的收获,并上升到对国家、民族、历史命运思考的高度。

应该说,《乡村叙事》作为一个历史舞台上的匆匆过客,或曰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一个小人物的回忆,居然产生如此效应,确有其偶然性。请看鹏森兄在后记里的一段话:这是一个“乡下佬”写的土得不能再土的回忆录,希望它能给那些关心大集体时代中国农村的社会学家、历史学家和其他人文学者乃至意识形态专家,提供一点真实而鲜活的研究素材。当然也希望,它能给那些寒门学子提供一点励志的“正能量”。也就是说,作者本人未必知道,自己的回忆能填补千百年历史叙事的空白,以致像刘少奇从云端跌入谷底时曾感叹的,“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!”亦如冯骥才在《一百个人的十年》中,借一位军代表的口所云,“人民的经历,才是时代的经历。”

然而,《乡村叙事》这种超常规的叙述方法,一般文化水平的读者可能会产生阅读疲劳,犹如鹏森兄少时初读《说唐》、《封神榜》等古典小说,跳过其中的诗词,直奔情节的景象,那就是跳过理论分析,直奔作者 20 年的乡村故事。这一阅读现象如何拿

捏,值得人们思索。

最后,《乡村叙事》采用多学科交叉透视、剖析历史的叙述方法,这无疑契合了全球化背景下,多元文化相融合的时代特征。我在20多年的办刊过程中,愈来愈明显地感受到多学科交叉研究理论的紧迫性和重要性。因为在日新月异的全球化时代,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,将前现代、现代、后现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,特别是目前已进入后真相时代,从而使人们无法以单一学科来观察社会、观察历史,如鹏森兄近年研究的诸多社会领域,倘若不将政治学、经济学、社会学、教育学、心理学,甚至人类学等放在一起去分析那些新的社会现象,又如何从历史视野、哲学思辨的高度,来鸟瞰奔腾的历史长河呢?所以,《乡村叙事》的行文方式,思考方式,应是当下和未来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向之一。

综上,乃是我对《乡村叙事》的文本价值的基本看法,也畅谈了自己为何乐于为本书作序的基本出发点。

二

下面,我们来扼要分析这本回忆录的若干亮点。

鹏森兄在《乡村叙事》中专辟一章,通过写他的父母,来折射中国农民在大集体时代,抑或新旧社会转型之际的悲情与命运。这一章亦是全书最有感情、最有天然人生哲理的部分,而其中他父亲的英年早逝,对他的无情打击、对他的终生影响实在是太沉重了。

1968年农历十一月的最后一天，也是鹏森兄与其父一起度过的人生最后一晚。斯时，他随父亲从生产队的队屋记工分返家，在茫茫的夜色中，父子俩睡在草屋里最值钱的两扇门板上。半夜时分，屋外寒风怒吼，他在睡梦中突然被一种凄厉的呼叫其父的声音唤醒，只见其父在沉闷的呼噜声中已陷入深度昏迷，几小时后在一名“公社卫生员”的“抢救”下，莫名其妙地去世了！当时，吴父仅50岁，从症状和今日之医学常识看，应该是得了脑溢血而故去的。这种心血管病，按当下的说法，是一种吃出来的富贵病，而在那食不果腹的年代，贫穷的乡村农民不可能得这种富贵病；另一说法是心病所致，吴父得此病应是心因所致。其主要原委，乃是三年大饥馑时，吴家饿死了鹏森兄的奶奶、一个残疾姐姐和一个小小弟弟。试想，世界上有几个中年男子汉能承受母亲和一对儿女饿死的悲剧？吴父的心血管病显然是憋出来的啊！

吴父去世时，留下一个残破的家，鹏森兄才虚岁12，上有一个16岁的姐姐，下有一个3岁的小妹，母亲肚里还怀着一个小小弟弟。从此，鹏森兄按照农村的规矩，作为长子，竟然成了一家之主，并汇入了无数贫困农民修“地球”的人海之中。至于在吴父“祭七”之日，他们幼小的姐弟如何在风雪迷漫的冻土里，祭拜父亲的悲情一幕，请诸位看官去仔细阅读吧。

父亲之死，对吴家来说，就是天塌下来了。我自丧父之日起，亦有这种痛彻心扉的体验。更可怕的，父亲的死对鹏森兄的人格形成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，他在书中也毫不犹豫地记下了自己的人生感悟——

的确,父亲的死对我的打击太大了,甚至可以说影响了我的一生,尤其是对人的生死的理解,可能比绝大多数少年都要来得早。从这一天开始,在我的心灵上固化了一个重要的意识,人是要死的,而且随时都可以死。有时候,我在晚上睡觉前突然问自己,这一觉会不会在明天早上不再醒来?在心理学看来,它其实就是因为一个未成年人目睹父亲的死亡全过程,而造成的巨大的心灵创伤。后来,我读到《红楼梦》中的一句话,“正叹他人命不长,哪知自己归来丧。”感觉作者对人的生死的理解和我的心灵是相通的。

这种对死亡的不确定性的感悟,甚至影响到我的人生观,尽管我后来在大学所接受的教育是一种唯物主义理论。一般而言,无论是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,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都强调人生要积极向上,要积极“入世”,要主动地去“改造世界”。然而,在我的心灵深处,却始终有一种消极的心理长期与之对抗,这种消极的心理上升到哲学层面就变成了一种“悲观主义”人生观,觉得在终极意义上,人生也好,地球也好,最终都要毁灭。这种积极主义和消极主义的同时存在,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我的一生。一方面,从年轻时起,也有一种积极的人生冲动,就像古代先贤所引导的那样,心忧天下,志在四方;另一方面,却又很早就有一种消极的人生观在不断地干扰,总是在泼自己的人生冷水。这种心灵深处的矛盾和哲学挣扎,最终导致自己的人生难有作为。

当然,纵观已过花甲之年的鹏森兄,他在艰难的人生历程中,并没有真正地消沉,也并非一事无成。以我的观点看,像吾等这种草根阶层,能有今天的成就已属相当不易。但是,对一个贫穷家庭来说,无论农村还是城市,家庭发生的重大不幸,毕竟是一场大悲剧、大灾难!

如果说,吴父以其坚韧不拔,在生前拼倾全力匡扶风雨飘摇中的草屋和一家老小,那么鹏森兄的母亲,在其极为艰难的后半生,作为家庭的精神支柱,竭力带大了几个孩子,亦可歌可泣。

吴母还是一个典型的能在社会转型期,改变人生命运的不平凡的农村妇女。这虽是一个案,却也是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许多农民的缩影。

吴母命运的改变,同样肇始于其苦难的童年。她4岁丧母,因父亲在外谋生,故与祖母相依为命,后又遭受继母的变态虐待,直至继母用针扎她的全身!这样,吴母少时便离家当了童养媳。从此,吴母在这个厚道的夫家开始窥见新的天地,乃至到一个国军的爱国将领家帮工,从而使其慢慢具备了见识世界的胸怀和坚毅的意志。

这也是家庭变故给吴母带来的城市生活经历。然而,土改运动对中国农民巨大的吸引力,吴母经不住父亲的一再要求,为了多分一份田地而返回了家乡,从此终身务农。

正是这些戏剧性的复杂经历,铸成了吴母有别于一般农妇的精神境界,并在中年丧夫之后,独立支撑起整个家庭。这些细节在鹏森兄的笔下,如九曲回肠的溪流缓缓道来,令人百感交集。同时,鹏森兄在文中隐隐约约流露出母亲坚定地支持他考

上大学后,母亲成为家中主要劳动力的遗憾,兹录如下——

但是,随后的几年,母亲将要为这一决定付出沉重的代价。1977年冬,我真的考取了大学,第二年春节后不久,我就离开了家乡,这一去就是四年。本来,自父亲去世后,我们已经熬过了最艰难的几年。后来姐姐虽然出嫁了,但有了儿子的接力,本不再需要依靠母亲来撑持了。现在,由于我去上大学,家里又重新陷入无劳动力的状态。妹妹弟弟还在中小学读书,年纪已大的母亲重新成了家中唯一劳动力。

1979年,中国农村经济体制出现了根本性变革。农民梦寐以求的大包干在极短的时期内迅速地各地铺开。大包干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,也很快就解决了中国几亿人长期以来无法解决的吃饭问题。而中国只有解决了最基本的吃饭问题,才有可能在其他问题上寻求突破和发展。因此,农村改革的成功是中国转型的关键一环。然而,突然而来的大包干也给那些没有劳动力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打击。当时流行的一句口号:“辛辛苦苦几十年,一夜回到解放前”。对这句口号体会最深的,不仅是那些“老革命”和“教条派”,还有那些农村缺乏男性劳动力的困难家庭。

在大包干的农村改革实践中,只有这种家庭缺乏劳动力的亲身经历,只有真正尝到其间的苦处,才能写出上述文字,才能对一项政策提出自己独特的理论见解。

幸运的是,吴母享有高寿,于2017年以93岁高龄仙逝。当

我读到吴母在孙子婚礼上喜笑颜开的情景，不仅为吴家苦尽甘来而欣慰，而且涌现出发自肺腑的无限羡慕之情……

走笔至此，我忽然想起前几年吴母脑梗后，在鹏森兄家里康复过程中，经常在吴淞江畔的花径上散步的情景。一天黄昏，夕阳映照着红彤彤的吴淞江，我正好撞见鹏森兄夫妇挽着老太太在缓缓散步，我由衷地对鹏森兄说：“你们这两个孝子孝媳，自己都一大把年纪了还有慈母可孝，真是天大的好福气啊！”这何尝不是吴老太太的福气呢！

鹏森兄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，对土地有天然的情愫，因而他对中国以土地为中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、社会主义革命有着深刻的认识，即使他没有亲身经历的政治运动，亦能触类旁通，识见高人一筹。

以鹏森兄对中国革命的重要一环土地改革的见解而言，是基于其家族、特别是外公和母亲，以及村庄里的长辈命运的关切，方能既发人深省，又蕴含着历史经验。以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三年解放战争为例，由于国共双方军队的成员，主要是广大农民，所以他们博弈的背后，土地与他们之间的命运是休戚与共的。请看，鹏森兄是如何评价国共战争之胜负的——

中共 1949 年革命成功以后，所发起的第一个政治运动就是土地改革。实际上，土改是伴随着解放军的脚步不断向前推进的，在整个解放战争过程中，前方是解放军在浴血奋战，后方就是工作队在进行“土改”，二者是相互促进的。解放军将国民党的军队打败了，将国民党的政权体系摧毁